

7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社會
卷

11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民
文獻
類編
續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社會卷
11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一冊目錄

北京平民大學寒假講演錄	平民大學出版部編輯課編	平民大學出版部編輯課，
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
新農村體制建設論之批評	農本主義研究會編	東天紅農民教育部，一九四三年
出版		六五
定縣實驗工作提要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輯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九三四年
出版		二〇三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暫行章程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	中華平民
教育促進會，民國間出版		二七九
察哈爾省農村建設委員會組織辦法大綱暨各項辦事細則	察哈爾省農村建設	
委員會編	察哈爾省農村建設委員會，民國間出版	
二九三		
漕河涇農學團概況	中華職業教育社編	中華職業教育社，一九三三年出版
三一三		

北平
平民大學
寒假講演錄

汪大燮署





前任英日公使國務總理外交總長教育總長
——
本校校長兼董事汪伯唐先生

北京平民大學寒假講演錄目次

序

兩漢文藝概論

一至二 朱希祖講

國語運動小史

二至七 黎錦熙講

現於論語孟子兩書中與儒教相反之政治思想

八至二十 吳貫因講

民國以來新司法制度施行之狀況及其利弊

二十至二十三 余榮昌講

大智之特點

二十三至二十五 張耀翔講

訴訟談

二十六至三十 石志泉講

近代民治的趨勢

三十一至三十七 胡汝麟講

歷史補助科學的避諱學

三十七至四十六 陳垣講

唐虞時代政治經濟教育下之國民

四十六至五十一 陳筑山講

國家與教育

五十二至五十四 瞿世英講

附錄 本校十七年暑假招生簡章

序

客冬寒假本校聘請京中名人舉行公開講演歷時四星期講演凡二十餘次雖嚴冬而聽者未稍輟大有環橋聽經之概此數年來所罕見者爰集講詞付諸剞劂分贈聽者以策其奮勉行見青年嗜學之心將日益篤而斯錄之刊必將爲求學之鑑有以導青年於奮勵之途而爲轉移學風券也書凡十篇以講者核訂先後爲次都六萬餘言惜陳君通夫因病缺席周君作人講詞未及訂正殊爲遺憾司記錄者爲本校優學生饒章二生也民國十七年四月三十日王文俊序

北京平民大學寒假講演錄

兩漢文藝概論

朱希祖先生講演

饒紹樞章雄翔筆記

兩漢文藝，有南北兩派之別，內容甚為複雜，非一二小時所能罄述。今就其用字造句一端，分為南北兩大派，列論於下：

北派多散文，南派多駢文。春秋以前，中國文學，北方極盛，大抵句調參差，春秋以後，南方文學始發達，句調較為整齊。蓋散文求其異，駢文求其美，故就歷史上觀之，散文乃發生於北方，而駢文則發生於南方也。迄於秦漢，南方地方擴大，土宇統一，南人欲知北方文學，故必研究古訓，北方則語言多合古訓，於此不甚注重。然南人因研究古訓，為文乃喜用古字，流為風氣，北派則反是，其作文以台乎實用為主。

南派以司馬相如為始，而以北人學南派之班固為殿；北派以司馬遷為始，而以南人學北派之王充為殿。

司馬相如，蜀人也。為文好用奇字，蓋相如深通小學，明於古訓，（作凡將篇見漢書藝文志），故其所作賦頗多難識之字。郊祀歌十九章，亦大半為其所作，當時通一經者不能讀，多覺集五經家乃能通之，然此猶就其約言之耳。至其散文，若封禪文，若上書諫獵，若諭巴蜀檄，其句調多整齊近駢，其用字多飾以古義。如「深恩廣大」之為「湛恩龐鴻」，「設官治事」之為「展采錯事」，「悅豫」之為「閑澤」，「廣散」之為「曼漢」，（皆見封禪文），其例不勝枚舉。然相如雖澤好駢，但句調均自創造，所謂自鑄偉辭，不事摹倣，此其所長也。

漢武帝嗜文學，讀相如文，謂恨不與生同時。及相如入長安，武帝常令其視草，蓋嘗慕其文而學之也。然武帝不諳小學，而欲澤古，其造句用字，乃不得不摹仿古書，運用成語。觀武帝之詔令，潤色詩書，與高，惠，文，景之詔令殊異。其冊三王文，摹仿尚書，下開揚雄潘岳之風，此顯而易見者也。

揚雄亦蜀人，其辭賦皆擬相如，亦深通小學，著有訓纂篇，及別字十三篇（見漢書藝文志），別字蓋即方言，故其作文，亦好用奇字。其辭賦乃近乎駢麗之文，無論矣。法言已學北派之散文，然仍好用奇字，如法言序之「墓道檢柩」即「動由矩規」，「控側顛蒙」即「無知頑愚」。法言本文中，句調雖似論語，而奇文怪字，例不勝舉。不特此也，雄之造句，專工摹古，辭賦擬相如，已言之矣；他若反離騷摹屈原，百官箴摹虞人箴，解嘲摹東方朔答客難，甚至太玄經摹易，法言摹。論語，此又文藝之一變也。

至於後漢，如班固者，本為北人（扶風安陵人），仿史記作漢書，而其為文，亦喜用古字，好為駢文，且工摹擬。蓋固亦深通小學也。漢書藝文志言揚雄作訓纂篇，順給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十三章，隋書經籍志所載班固太甲篇，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之內。其辭賦中好用古字無論矣，即其漢書，亦多用古字，後漢書曹世叔妻（名昭，即曹大家）傳云：「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足見其字義難通矣。固生平最喜同馬相如楊雄文，不特其賦摹仿二人，即其散文及漢書序論，亦皆摹仿之。試讀相如楊雄之散文，與固文聲調節奏，大抵相同，而其典引之摹擬相如之封禪文，楊雄之劇秦美新，答賓戲之摹擬揚雄解嘲，猶顯而易見者也。——以上南派。

司馬遷生於夏陽龍門，時相如爲文，好用奇字，武帝爲文，潤色詩書，艱深之尚，擬古之端，已由此而啟。遷乃一反其所爲，造句參差不齊，純任自然，用字貴乎合時，不尙窳古，重創造，而非摹仿，頗與司馬相如相同。觀史記所述唐虞三代之事，其涉於尙書者，往往以通用之文，易古語，或以淺顯之詞易奧義，言明且清，而不失本旨。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尙書堯典）易爲「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史記五帝本紀）；「允迪厥德，讓民弼諧」（尙書皋陶謨）易爲「信其道德，謀明輔和」（史記夏本紀），此所謂易古語也。「日明明敷側陋，師錫帝曰，有饒在下，曰虞舜」（尙書堯典）易爲「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稭在民間，曰虞舜」（史記五帝本紀）；「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旣益奏庶鮮食」（尙書皋陶謨）易爲「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橇，行山焚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史記夏本紀，此所謂易奧義也。試以尙書與史記對讀，其例甚多，不勝枚舉。近聞王充指意難觀之戒，遠啟韓愈詞必已出之條。（唐李商隱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正謂韓愈學史記耳）。其政迪後人之功，蓋非淺鮮也。

至於漢後，如王充者，本爲南人，（會稽上虞人）。而其作文主張與司馬遷相似。作論衡八十五篇，其自紀篇云：「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辨以共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潛典雅，指意難觀，惟賦頌耳。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詭異，不名曰材鴻。」又曰：「筆語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此反對用古字也。自紀篇又云：「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

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而，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醇，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辭眉當復八采，馮目當復重瞳。」此反對摹擬也。自王充出，於是魏晉以後，競以易識字爲文章之科條矣（梁沈約有三易之說，言易識字，易見事，易句讀也。——以上北派）。

此兩派影響於後世者甚巨。從大體言之，魏晉南北朝衍南派，多駢文，句貴自造，此司馬相如之風也。唐宋元明清，衍北派，多散文，句亦貴自造，此司馬遷之風也。而用古字摹古辭，自魏晉以迄清末不斷。作駢文及散文者。皆有之，蓋各得偏雄之一體者也。

國語運動小史

黎錦熙先生講演

章雄翔饒紹樞筆記

國語運動在今日，似乎入了倒霉的時期，雖不至一落千丈，但最少也是一落五百丈。這大概是因為我們國民性，遇事熱烈而不能持久的緣故。常言道「五分鐘的熱度」，這實在社會的理性之表現，並不關乎反動方面勢力。

說到「國語」兩字，須知有廣狹二義的分別。現在所講，以狹義的國語爲限。至於廣義的國語，是包括古今一切用本國語文字所發表的東西而言。如用英文來表示：廣義的國語，便是 Chinese；狹義的國語，便是 spoken Chinese，但這範圍太大，須加上一個 Standard（標準），把各地的方言土語除外，這便叫「國語」；將國語寫在紙上的，便叫「國語文」。現在全國小學校用的教科書，就是這種狹義的國語文。中學以上，自民國十一年公布新學制後，國文科也多改稱國語科，但此是廣義的國語

古文，方言，都包含在內，從來就沒有單用白話的。至於「運動」，便是說「有意的宣傳」。假若是無意的，那種事雖忽然風行一時，也不能說是「運動」。假若是有意的事，從事於研究，調查，實驗等等事業，而沒有宣傳的形式，也不能說是「運動」。凡運動都有一種諸語的口號，一名「標語」，從前講學家就叫做「宗旨」。國語運動的口號是：「國語統一」；言文一致。現在所說的「小史」，便是簡單的報告這八個字宣傳和實行的經過狀況。隨便談談，不拘體例，故名「小史」。

國語運動究竟起於何時？並非這幾年才鬧出來的，而且並不止於民國，前清末年，便已成了有意宣傳。再說遠一點，應該上溯二千二百年前，那時有一個國語運動大家，便是李斯。誰都知道李斯這個人是幫助秦始皇焚書坑儒的一個罪魁，然而却沒注意他國語運動的功績。假使沒有他那樣熱烈嚴厲的來提倡國「字」統一，恐怕國語統一的運動，到今日還說不上來。李斯以前，文字極不統一，只看許慎的說文解字序中，說那時「言語異聲」之外，還說了一句「文字異形」；春秋戰國諸侯，每在諸鼎彝器上鐫刻文字，後來陸續出土的，異文極多，便可作證。到了秦始皇時，用李斯之言，才利用國家的威權，實行文字統一的政策。只看史記秦本紀和李斯列傳中，常有「同文書」、「書同文字」的標語。又李斯常跟着始皇巡狩名山大川，到處刻石作紀念，寫作都由李斯包辦。如現在山東膠州南日照縣屬的琅琊台，他們也有刻石，上面就有「同書文字」的標語。中庸裏邊「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理想，秦時的確實現了。那時的「國字」，自然是李斯審定的小篆，但這是正體，還有一種別體叫隸書。隸書可說就是現在楷書的同體，不過寫的筆勢不同罷了，所以小學家叫楷書作「今隸」。那麼現行的「國字」，可算是從那時規定的，統

一的了。李斯自己編了一部小學識字課本，兼作小學習字帖用，書名叫「倉頡篇」（現在亡佚了，孫星衍有輯本）。因此中國語言文字學就叫「小學」。他們所焚的書，乃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所坑的儒，其中一部分也許就是不遵用「國字」的。古籍遺失，罪在楚霸王之火燒咸陽，這是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可辨別的。李斯統一一切的手段，未免太嚴酷了，然而其功究不可沒，尤其是厲行「國字統一」這件事。經過二千多年的訓練，「國字統一」十分成熟了，我們才進一步而謀「國語統一」。「國字統一」，要算國語運動的歷史上第一件大事。

後李斯百餘年，又出了一個專制魔王，就是漢武帝。這個人於國語運動上也很有重大的關係。那時很可笑：作官吏的多看不懂皇帝的詔書和政府的律令，小百姓們更不用說了。如漢書儒林傳載丞相公孫弘奏稱「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云云。我們讀過漢初詔令文的，覺得雖雅而並不古，雖厚而並不深，實在不難懂，可見那時候吏民對於文事，程度實在太淺，也就因為應用的文體太無標準之故。文體沒有標準，大家便無從得到一種共守的文法，用詞造句，各憑自己的習慣，大文豪司馬遷尚免不了這個毛病（金朝王若虛澤南遺老集中，舉發史記虛字用得不通的至數卷之多）。要規定標準的文體，便須選定標準的讀物，單把識字的課本如倉頡篇之類教學生是不行的，單教預備做官的人讀律令，也沒甚麼意思。公孫弘一班人把這種標準讀物想出來了；就是經書，那時還叫「六藝」，可不是從前孔門諸君要實習的「藝」了，只是幾部書。這幾部書，來頭大，內容富，文章雅，最宜於作標準讀物。於是他們定了一種「功令」：凡官吏通「藝」最多的，儘先升補，外放優缺（詳細辦法，可參考儒林傳原文）。在首都傳習這種「藝

「的教員，就是博士官，學生叫博士弟子，那時學生不過五十人，後來加到三千人。總之，這幾部標準讀物，經這麼一提倡，不但全國的思想文化都入了儒家的範圍，就是標準文體也因之確定。這就是科學制度的起源。歷隋唐宋明到清末，二千年間，中國社會一切活動，習慣，乃至迷信等等，都是以科學制度作中心的，直到距今不過二千年間才廢止。標準文體藉科學的力量，真弄得規模大定，而且勢力雄厚，推行甚遠。這就是現在所謂「文言文」。我們不能說文言文是活的，因為他與語言不一致，說話不適用。但也不能說文言文是死的，因為他也和「國字」一樣，經了二千多年的訓練，於不統一的語言之外，得到一種特別的統一，就是上層階級彼此通行的一種超語言的文體。自然，這種標準文體，只能謂之「文體復古」，和現在國語運動的「言文一致」恰相反對；但漢武帝那時，何以不編定一種「言文一致」的讀物，來作文體的標準？此是事勢上的不可能。那時我國版圖擴大，而交通不便，方言不齊，無法使國語統一。既無標準的語言，將使文體與何種語言一致？若各與方言一致，那更糟了，各講各的方言，各寫各的文字，彼此相隔數百里，就不能通詞達意了。所以那時只得規定一種超語言的文體，用科學制度作有力的永久的宣傳。那時不是不要言文一致（如公羊以齊人語釋經，楊雄作方言之類，學者們都是注意當時語言的），乃是不配講言文一致。到如今，交通發達印刷進步，教育普及，國語統一，有了標準的「國語話」，才可以大胆的提倡「國語文」，才配講言文一致。所以國語運動這兩句標語，「國語統一，言文一致」，正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雙翼，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秦皇漢武辦不到國語統一，他們是明白人，所以也不敢辦言文一致，只得把超語言的古體文定作標準文體。現在我們才進一步而謀「言文一致」，

這是時代進化，雖相反而並無衝突，用意更屬相同。所以「文體確定」，也是算國語運動的歷史上第二件大事。

以上秦皇漢武關於國語運動的兩件大事，都遠在二千一百年前。這二千多年間，文學界也時常有這種運動，漢魏的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實在都是屬於這種運動的範圍。為時間所限，一概從略。前年為美國開國一百五十年紀念，應費城萬國博覽會的徵求，曾製了一張簡明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意在表明歷代文學界這種運動，可作參考，以補本講之缺憾。本講從此就度到清末了。

請本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國人連受了這三次大刺激，有識者都感覺到民智不開，難以立國。便一面主張興學育才，一面主張啟發民智，於是發生一種「字母運動」。他們惟一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却不甚注意「國語統一」。他們是受了日本假名和西洋拼音字制的影响，加以本國連打幾次大敗仗，割地賠款，激發了愛國的天良，於是推究原因，以為船堅砲利，我固遠不如人，而識理知文，民智民力，人亦大勝於我。一般人便想對於繁重難學的漢文漢字，謀根本的改良。第一個字母運動家要算福建廈門盧超章。那時他著的切音新法，早已推行於廈門等處，不識字的，學半年便可隨意通信。戊戌年，就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的同鄉京官林略存，替他運動都察院上了一本奏摺，大意是字學繁雜，請探定切音新字頒行天下。居然於七月二十八日奉了上諭：「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取盧超章等所著之書，詳加考驗具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現在的外交部，這種事情，於外交毫無關係，乃著外交部去辦，要是在現在，真算公文上的笑話，政府公報一定又要聲明更正的。但那時這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實在是總理一切新政的衙門（又簡稱總理

衙門，其中流品最雜，所以以歷史來著名的廣和居，現在還有一種菜叫總理衙門的，乃渾蛋湯也。而且那時並無所謂教育部，學部也還未設，只有禮部，也無內務部，即民政部也未設，只有戶部。這種關於國語運動的事，禮部戶部自然覺得不倫不類，不願意管，只好以「洋務」論，交與總理衙門。不料一聲霹靂，政變發生，這事擱淺下去。

同時造新字的人，還有福建力捷三的切音字，江蘇吳縣沈學的盛世元音，福建龍溪蔡錫勇的傳音快字，廣東香港王炳燾的拼音字譜等。這些都是用簡單符號，如弧形線，圓圈之類，來表示聲母韻母的。漸漸衍成「中國速記術」。如蔡錫勇（戊戌前作過海關道）的兒子蔡璵。就是家傳速記術專家。自前清資政院到民國歷屆國會，都用他的速記術作議事錄。近幾年我的朋友汪怡才改造了一種國音速記術，但他也是蔡錫勇的私淑弟子。速記學上的東方建設，也算國語運動的副產物了。戊戌政變以後，新學新政真入了倒懸時期。反動派勢力大振，不過兩年，鬧成庚子事變。辛丑和議既成，新事業又興起。乙巳年（光緒三十年），盧翹章奉詔入都，學部仍舊叫他欽遵前旨，赴外務部呈遞他的切音字母（外務部即總理衙門所改，載在辛丑和約，定為各部院之首。直到現在，外交部仍居國務員之首席）。外務部又往學部推，學部又延擱起來。害得他在北京守候了差不多一年之久。後來學部用三千字的公文給批駁了。

以上是戊戌前後一批國語運動家的故事。他們大都是福建廣東人，所宣傳的只是拼切語音的工具，故謂之「字母運動」，但他們却大膽的叫做「新字」。繼此就是直隸河王照，和浙江桐鄉勞乃宣。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正是庚子那一年（光緒二十六年）在津成書的。書中隱去姓名，自稱蘆中窮士，完全摹倣日本

的片假名，採取漢字中的某一部分，作為字母。例如現今注音字母的「父」他作「才」，是採取「撲」字的偏旁。注音字母的「」，他作「五」，是採取「五」字的下部。注音字母的「丫」，他作「了」，是採取（阿）字的首筆。凡聲母五十，就叫「字母」。韻母十二，名為「喉音」。合共六十二個字母，第一位實行宣傳這官話字母的，是天津嚴修（那時他作翰林院編修），他家裏人人都練習得很熟，其次便是桐城吳汝綸，他以桐城派古文老將的聲望，很熱烈的宣傳這種字母，自然影響很大。他宣傳的理由，却是偏重「國語統一」。「國語統一」這個標語，可以說是他叫出來的。那時贊成這種字母的，大都因為目不識丁之婦孺，彙句即能學成，即能彼此通信，真是神速。如光緒二十八年宛平生員王璞呈請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准推行這種字母的呈文中，說這是使人人能讀書，人人能看報，人人能讀詔書示諭的便捷之法。大家只注意「言文一致」的好處，還沒有打起「國語統一」這塊大招牌。及到吳汝綸上書張管學大臣，才說「此音書是京城聲口，尤可使天下語音一律」。吳先生這種感想，也是他游日本時得到的。日人伊澤修二極力勸他提倡國語。有一天在席上指着一個薩摩人阿多對他說：「三十年前，我們對面不能通姓名，猶如貴國福建廣東人之見北京人也。然今日僕與阿多君說話已無一點差異。這不過是在薩摩地方設立師範學校，教師範生學習國語（東京語），歸而傳授，得此效果。」所以吳氏歸國後，便非常注意這件事。果然，張管學也具有同感，光緒二十九年，他和榮慶，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其學務綱要第二十四條，「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家母講書始。……茲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那時中央威權甚大，部

章必須遵守。雖沒規定把王照的書作課本，但官話字母因此就有不脛而走之勢。（光宣之交，我在湖南優級師範，要遵章傳習官話，也用過這種字母。同學的多以為怪異。也就因為部章沒有規定課本，致各省於官話一門，多不一律，不免發生笑話。例如福建各學生教這門功課，一律要請駐防的旗人作教習，大約是沿襲他們從前官話學堂的舊法罷，開首幾句話，一定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有一個姓林的起而反對，便捉將官裏去了。）

給王照的官話字母作護法的，除嚴修與汝綸兩君外，還有一個力量更大的，便是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光緒二十九年，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向他上了了一個四千來字的呈文，請他奏明皇上，頒行官話字母，設立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他雖沒有據以入奏，但即刻飭督署的學校司妥擬推行辦法。他的批詞中說：「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高明者徂典雅之文而書為無用，愚蠢者本無普通之識而駭為創聞，必先引其端倪，而後可收成效。」癸卯迄今，經過二十五年了，不想「人情」猶尚如此！次年，直隸學務處通令全省蒙學堂傳習，又專設許多義塾，又派了專員經理，又撥了官款詳譯書報，又定了獎勵辦法，又由督署札飭直隸提學司將官話字母加入師範及小學課程中，並在天津設立大規模的簡字學堂，輾轉傳習。於是兩江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也各在省城設立簡字學堂。傳習官話字母，奏明立案，這都是光緒三十一年間的事。那時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傳播很廣，到現在還有許多人沒有忘記的。

勞乃宜是王照的「同志」，他的簡字全譜是光緒三十三年在南京出版的。京音一譜，全依王氏。於京音五十母之外加六母，十二韻之外加三韻，為寧音譜。兩江總督所辦的簡字學堂，就是

用他的寧音譜。又加咸六十三母，十八韻，為吳音譜。又加咸八十三母，二十韻，為閩廣音譜。合共一百十六母，二十韻。為簡字全譜，包括全國各地的方言。因為他是一位講等韻學的專家，（他的等韻一得，可以說是集等韻學之大成的書），所以頭腦較複，規模較大，主張也就和王氏略有異同。他把「言文一致」擱在「國語統一」之前，主張南人先就南音簡字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這在北方自然不成問題，而在南方便出了激烈的反對派，上海中外日報便是反對派的代表。這報上常有罵勞氏為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說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於同文之治」，若要統一語言，即當「強南就北」。勞氏通函辯護，說照他的辦法，用不著強南就北，自能「引南歸北」，因為無論寧音吳音各譜，其中都把京音一譜嵌了進去。所謂「以隨地增損適其變，而仍以有增無減統其同」。現在看來，勞氏這種辦法，實在不錯。何者？「言文一致」，為的是普及國民的教育，「國語統一」，為的是便利國民的交通。人人是要教育的，可不能說人人是要交通的，農夫樵子，實在無打官話的必要，却有讀書閱報增加智識之必要。後來注音符號，以國音為主，也要隨地添加「問音字母」。一來便利平民，使能就方言拼字。二來便利學者，可用以調查語音，採訪方言文學，旨趣和勞氏相同。勞氏於光緒三十四年召見，他面奏西太后，宣傳簡字的用處，太后叫他呈進。那年他恭繕一部簡字譜錄，凡五種，進呈御覽，請旨頒行天下。並請於初等小學以前增加一學年，專教簡字。先各習本地方音，以期易解，次通習京音，以期統一。一年畢業之後，再教漢字。並請實行強迫之令，全國人民，凡及歲者，皆必入此簡字之學一年，不學者罪其家長。並請預頒定制，將來實行立憲，凡不識漢字而能識此簡字者，一體准作公民。又勒

定五年之後，官府出告示，批呈詞，皆參用此字。現在看來，那時的國語運動家，比現今實在乾脆得多了！簡直就在漢字之外，另選一種「言文一致」的文字出來，遠承秦皇漢武之規，更開新局，何等淋漓痛快！此摺上後，奉旨：「學部議奏。」（所以這部御覽的膳進本，現還在教育部的文書科。）誰知學部竟置諸不議不奏。宣統元年，清廷已經籌備立憲，勞氏乘勢又上一摺，仍交學部議奏。學部還是不議不奏。勞氏兩次上書學部，請其從速集議，他可赴部備詢。學部又置之不議不答。他於是聯合一班名流，如趙炳麟，汪榮寶等，在北京發起一個「簡字研究會」作社會的宣傳，這可以說是後來「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的先聲。延至宣統二年，他的朋友唐景崇作學部尚書。他寫信促其速議速奏。信中說「中國於漢字之外，別用一種主音簡易之字以爲補助，可信其必有此事」。唐景崇是一個極端守舊的老先生，更置諸不議不答了。那時學部中人反對簡字，也是以分裂語言，有碍統一爲理由。其實是怕簡字一行，漢文危險。

勞乃宜的「簡字運動」既厄於學部，他便改從議會下手。那時資政院成立，這就是清朝預備立憲時代第一屆變相的國會，他自己是一個議員。前說王照得到兩個名流作護法，曰嚴修，曰吳汝綸。這時勞乃宜也得到兩個名流作護法，曰江謙，曰嚴復，這兩位也是議員。江謙著了一篇小學教育改良勸議，開口第一句就說：「初等小學前三年，非主用合聲簡字國語，則教育斷無普及之望。」這也是句很直截了當的話。那時清廷立憲，定期籌備九年，從光緒三十四年起，到宣統八年止，命各部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清單。學部清單中列有國語教育事項五條，要緊的是：宣統八年，檢定教員須考問官話；師範，中學，高小各項考試，均加官話一科。宣統八年就是民國五年，清廷是預備那一年普及國語的

。豈料那一年竟只忙着洪憲皇帝的大典呢！不過學部只標明官話字樣，總不提及簡字；江謙便在資政院提出質問的說帖，質問學部此項官話課本是否主用合聲字拼合國語？是否標準京音？是否正名爲國語？說帖的末了還有這麼一個結句，「毋使人謂學部空言普及教育，統一國語，區區國語教育之消息而不知之，而儼然握全國最高教育機關也！」此項質問，有議員三十一人連署。同時有機輔，江南，四川各地學界和京官等三百餘人向資政院請願推行官話簡字。於是院中推嚴復作特任股員長，從事審查。審查的結果是「謀國語教育，則不得不添造音標文字。」「將簡字正名爲音標，由學部審擇修訂，奏請欽定頒行，」「音標用法有二：一，拼合國語，以開中流以下三萬九千萬不識字者之民智，而合蒙藏準回二千萬里異語民族之感情。二，矯正漢字讀音，學校課本每課生字，亦須旁注音標。」「請議長會同學部具奏，請旨飭下迅速籌備施行。」嚴氏將此審查結果在議場報告，大多數贊成通過。這麼一來，學部還要想法子延宕下去，便把此案推到中央教育會議去公決。這個會議，正會長是張謇，副會長是張元濟和傅增湘，宣統三年（即辛亥年）六月才開幕。剛把這統一國語辦法案議決，不料又是一聲霹靂，武昌起義，中華革命，國體改變，「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甚麼事都不能繼續有效，於是庚子以來十年間之「簡字運動」，便也戛然而止。

以上是清末二十年間國語運動的概略。各家所著的書和當時提倡的公牘文字之類，我將來有一部較詳的紀載出版；但勞乃宜以後的，已編了一些在拙著國語學講義的下編內，這書是十年前在商務書館出版的，要查這些掌故，還可參考，以補本講語焉不詳之處。

至於民國初元到今日的經過，諸君耳聞目擊，講不講倒也無

甚關係。總之，中國的國語運動，除那些文學界的小小波瀾不計外，其具有大刀闊斧的資格者，秦始皇時爲第一期，漢武帝時爲第二期。統一國字，規定文體，所謂東方文化，都積蓄在我們中華這種國字與文體之中，形成二千餘年以來的國民性。直到清末，受亘古未有之環境的壓迫和刺激，才入國語運動的第三期。以上所說清末的情形，不過是第三期的開始，其運動並未成功。即到如今，大家請注意，距成功之日還遠着呢！

現於論語孟子兩書中

與儒教相反之政治思想

吳貫因先生講演

章雄翔饒紹樞筆記

儒家最重要的著作，莫如論語和孟子。這兩種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代表。然儒家注重用世，所以政治方面的思想，實占儒家重要的地位，我們要研究儒家學說，不能不研究他的政治思想。但政治上的主張，同時必有相反的政治思想，非參觀對照，則真理何在，沒法知道。所以要研究儒家的政治思想，更不能不研究和他相反的政治思想。明白了反對的主張是怎樣的，然後儒家政治思想的價值，纔能確定。然而論語一書，由孔子的弟子們分別記錄而成，孟子一書却是自己所纂述。兩書都成於儒家之手。因此關於政治的主張，只叙自家的學說，對於反對者的議論，却以避實擊虛的手段概行抹殺。雖有強固的理由並不給他轉載。因此我們

要研究反對者的主張怎樣，資料實在缺乏。可是正面的反駁論，就可以見出反面的反對論。雖是一鱗一爪，很不完全，而藉這一斑未嘗不可引伸來窺探全豹。所以我要叙出論語和孟子兩書。內和儒家相反的政治思想。

一 荷畚丈人的政治思想

荷畚丈人是一個關心民物的有心人，孔子和子路也都承認他。不過古書不曾詳細記載他的學說。所以自漢以來，只認他是個消極的隱逸家。其實他正是個積極的實行家。丈人的政治思想，在當時是別樹一幟的。雖然論語上叙得不詳細，但就他和子路問答一章看來，已經可以發現他和儒家主張不同的地方有三點。列論於後：

A，丈人主張勞農自給而反對做官待哺。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以「致君」爲目的，其結局不能不作「做官」的生涯。所以孔子奔走七十二君之廷，席不暇暖，而對子貢問士，答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話。對子張問仁，又答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所謂「五者」：如「寬則得衆，信則人任，惠則足以使人……」，這都屬做官者的事情。問「士」和「仁」，和做官毫無關係，而告訴他做官的事。由這點可知儒家是把做官爲生涯的了。因其把做官作爲生活的中心，所以孔子對季康子問從政人物，就指出仲由，子貢，再有幾人可以從政。甚至「佛肸以中牟叛」，「公山弗擾以費叛」，來召孔子，孔子都打算去。像這種割據稱雄的亂臣賊子，一紙相邀，便想攀附，如此熱中，出處之間，未免太苟且了。雖說孔子有可經可權之才，就和他周旋，未必就爲權奸所利用；但尋常之士，輾轉做效，把從政作生活的根本而不顧其他，流弊所及，使拜官主義，浸淫于文人學士的腦中。凡能給我以官，雖赤眉，黃巾，皆可上表勸